

1932—1942

萧红 十年集

(下)

林贤治 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32—1942

萧红 十年集

(下)

林贤治 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37年，萧红从日本归来后，即前往拜谒鲁迅墓。左起：许广平、萧红、萧军，中间为海婴



1938年萧红在西安



1938年摄于西安。左起：塞克、田间、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后排为丁玲



1938年萧红（左）与丁玲（右）在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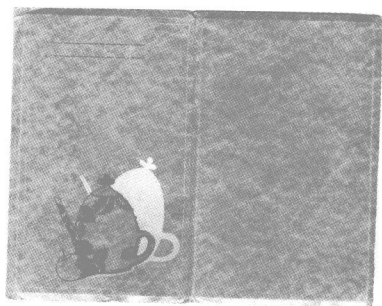
萧红与端木蕻良摄于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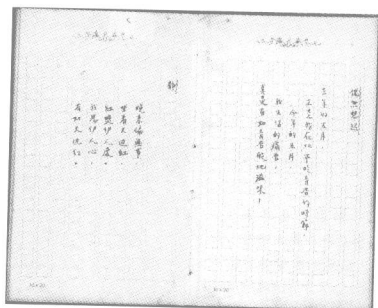
萧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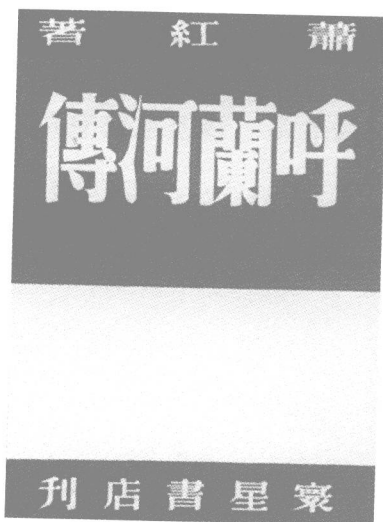
萧红1938年摄于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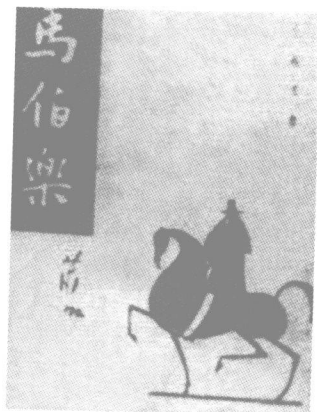
萧红将诗作订制成册，并设计了封面，起名《私の诗稿》



《私の诗稿》内页，萧红手迹



《呼兰河传》，香港寰星书店出版



萧红为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设计的封面

火线外(二章)

窗 边

M站在窗口,他的白色的裤带上的环子发着一点小亮,而他前额上的头发和脸就压在窗框上,就这样,很久很久地。同时那机关枪的声音似乎紧急了,一排一排地爆发,一阵一阵地裂散着,好像听到了在大火中坍下来的家屋。

“这是哪方面的机关枪呢?”

“这枪一开……在电影上我看见过,人就一排一排地倒下去……”

“这不是吗……炮也响了……”

我在地上走着,就这样散散杂杂地问着 M,而他回答我的却很少。

“这大概是日本方面的机关枪,因为今夜他们的援军必要上岸,也许这是在抢岸……也许……”

他说第二个“也许”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也许”一定是他又复现了他曾做过军人的经验。

于是那在街上我所看到的伤兵,又完全遮没了我的视线;他们在搬运货物的汽车上,汽车的四周插着绿草,车在跑着的时候,那红十字旗在车厢上火苗似地跳动着。那车沿着金神父路向南去了。远处有一个白色的救急车厢上画着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就在那地方,那飘蓬着的伤兵车停下,行路的人是跟着拥了去。那车子只停了一下,又倒退着回来了。退到最接近的路口,向着一个与金神父路交叉着的街开去,这条街就是莫利哀路。这时候我也正来

到了莫利哀路,在行人道上走着。那插着草的载重车,就停在我的前面,那是一个医院,门前挂着红十字的牌匾。

两个穿着黑色云纱大衫的女子跳下车来。她们一定是临时救护员,臂上包着红十字。这时候,我就走近了。

跟着那女救护员,就有一个手按着胸口的士兵站起来了,大概他是受的轻伤,全身没有血痕,只是脸色特别白。还有一个,他的腿部扎着白色的绷带,还有一个很直地躺在车板上,而他的手就和虫子的脚爪般攀住了树木那样紧抓着车厢的板条。

这部车子载着七八个伤兵,其中有一个,他绿色的军衣在肩头染着血的部分好像被水浸着那么湿,但他也站起来了,他用另一只健康的手去扶着别的一只受伤的手。

女救护员爬上车来了,我想一定是这医院已经人满,不能再收的缘故。所以这载重车又动摇着,响着,倒退着,冲开着围观的人,又向金神父路退去。就是那肩头受伤的人,他也从原来的地方坐下去。

他们的脸色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有的是黄色的,除掉这个,从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呼叫,哼声,一点也没有,好像正在受着创痛的不是人类,不是动物……静静的;静得好像是一棵树木。

人们拥挤着招呼着,抱着孩子,拖着拖鞋,使我感到了人们就像在看“出大差”那种热闹的感觉。

停在我们脚尖前面的这飘蓬的人类,是应该受着无限深沉的致敬的呀!

于是第二部插着绿草的汽车也来到了,就在人们拥挤围观的当中,两部车子一起退去了。

M的腰间仍旧是闪着那带子上的一点小亮,那困恼的头发仍旧是切在窗子的边上。宁静,这深夜的宁静,微风也不来摆动这桌子上的书篇……只在那北方枪炮的世界中,高冲起来的火光中,把M的头部烘托出来一个圆大沉重而安宁的黑影在窗子上。

我想他也和我一样,战争是要战争的,而枪声是并不可爱的。

小生命和战士

“你看那兵士腰间的刀子，总有点凶残的意味，可是他也爱那么小的孩子。”我这样小声地把嘴唇接近着 L 的耳边。

其实渡轮正在进行中的声音，也绝对使那兵士不会听到我的话语的。

其中第一个被我注意的，不是那个抱着孩子的，而是另外的一个，他一走上来，就停在船栏的旁边。他那么小，使我立刻想到了小老鼠。两颊从颧骨以下是完全陷下来的，因此嘴有点突出。耳朵在帽子的边下，显得贫薄和孤独，和那过大的帽遮一样，对于他都起着一种不配称的感觉。从帽遮我一直望到他黑色的胶底鞋，左手上受了伤，被一条挂在颈间的白布带吊在胸前，他穿着特为伤兵们赶制的过大的棉背心，而这件棉背心就把他装饰成一只小甲虫似的站在那里。等另外两个兵士走近前来的时候，他就让开了。

这两个之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是个军官，他并不怎样瘦，有点高大，他受伤的也是左手，同样被一只带子吊在胸前。在他慢慢地踱着的时候，那黑色皮鞋的后半部不时地被黄呢裤的边口埋没着。当他同另外的一个讲话的时候，那空着的，垂在左肩的军中黄呢上衣的袖子，显得过于多余地在摆荡——因为他隔一会就要抬一抬左肩的缘故。

我所说的挂着刀的兵士，始终没有给我看到他的正面，因为那受伤的军官和他谈话总是对立着，我所能看到的是他脚上的刺刀针，腰间的短刀，他的腰和肩都宽而且圆。那在怀中的孩子时时想要哭，于是他很小心地摇着他，把那包着孩子的军外套隔一会儿拉一拉，或是包紧一点。

不知为什么，我看他好像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忘掉他腰边的短刀，孩子一安静下来，他的左手总是反背过来压在刀柄上。

渡轮走近一个停在江心的货船旁边的時候，因为那船完全熄了灯火，所以好像一座小城似的黑黑地睡在江心上，起重机上还有一个大皮囊似的東西高悬着。

我是背着锅炉站着的,背后的温暖已经增加到不能忍耐的程度,所以我稍稍离开一点,可是我的背后仍接近着温暖,而我的胸前却向着寒凉的江水。

那军官的烟火照红了他过高的鼻子,而后轻轻地好像从指尖上把它一弹,那烟火就掠过了船栏而向着月下的江水奔去了。

我一转身就看到了那第一个被我注意的伤兵就站在我的旁边,似乎在这船上并没有他的同伴,他带着衰弱或疲乏的样子在望着江水。他好像在寻找什么,也好像他要细听一听什么,或者不是,或者他的心思完全系在那只吊在胸前的左手上。

前边就是黄鹤楼,在停船之前,人们有的从座位上站起来,有的在移动着,船身和码头所激起来的水声,很响的在击撞着。即使那士兵的短刀的环子碰击得再响亮一点,我也不能听到,只有想象着: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

10月22日

题内二章分别作于1937年8月17日、10月22日,发表于同年11月1日《七月》第2集第2期。署名萧红。

作者以赞美然而悲悯的态度写抗敌归来的伤兵,她的反战情绪似乎颇复杂,带有一点和平主义倾向。如《窗边》结尾说的:“战争是要战争的,而枪声是并不可爱的。”而在《小生命和战士》中,开头便说:“你看那兵士腰间的刀子,总有点凶残的意味,可是他也爱那么小的孩子。”如果画面上没有孩子的出现,那么凶残就是战争的全部。最后,她回应了刀子和孩子,这样写道:“即使那士兵的短刀的环子碰击得再响亮一点,我也不能听到,只有想象着: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这心跳就是热爱生命与和平的声音。

一条铁路底完成

一九二八年的故事，这故事，我讲了好几次。而每当我读了一节关于学生运动记载的文章之后，我就想起那年在哈尔滨的学生运动，那时候我是一个女子中学里的学生，是开始接近冬天的季节。我们是在二层楼上有着壁炉的课室里面读着英文课本。因为窗子是装着双重玻璃，起初使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从那小小的通气窗传进来的。英文教员在写着一个英文字，他回一回头，他看一看我们，可是接着又写下去，一个字终于没有写完，外边的声音就大了，玻璃窗子好像在雨天里被雷声在抖着似的那么轰响。短板墙以外的石头道上在呼叫着的，有那许多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使我想象到军队，又想象到马群，又想象到波浪……总之对于这个我有点害怕。校门前跑着拿长棒的童子军，而后他们冲进了教员室，冲进了校长室，等我们全体走下楼梯的时候，我听到校长室里在闹着。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光荣，使我以后见到男学生们总带着对不住或软弱的心情。

“你不放你的学生出动吗？……我们就是钢铁，我们就是熔炉……”跟着听到有木棒打在门扇上或是地板上，那乱糟糟的鞋底的笑声。这一切好像有一场大事件就等待着发生，于是有一种庄严而宽宏的情绪高涨在我们的血管里。

“走！跟着走！”大概那是领袖，他的左边的袖子上围着一圈白布，没有戴帽子，从楼梯向上望着，我看他们快要变成播音机了：“走！跟着走！”

而后又看到了女校长的发青的脸，她的眼和星子似的闪动在她的恐惧中。

“你们跟着去吧！要守秩序！”她好像被鹰类捉拿到的鸡似的软弱，她是被拖在两个戴大帽子的童子军的臂膀上。

我们四百多人在大操场上排着队的时候，那些男同学们还满院子跑着，搜索着，好像对于小偷那种形式，侮辱！侮辱！他们竟搜索到厕所。

女校长那混蛋，刚一脱离了童子军的臂膀，她又恢复了那假装着女皇的架子。

“你们跟他们去，要守秩序，不能破格……不能和那些男学生们那样没有教养，那么野蛮……”而后她抬起一只袖子来：“你们知道你们是女学生吗？记得住吗？是女学生。”

在男学生们的面前，她又说了那样的话，可是一出校门不远，连对这侮辱的愤怒都忘记了。向着喇叭台，向着火车站。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几千人的行列……那时我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觉得我的脚步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東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子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

走向火车站必得经过日本领事馆。我们正向着那座红楼咆哮着的时候，一个穿和服的女人打开走廊的门扇而出现在闪烁的阳光里。于是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叫改为“就打倒你”！她立刻就把身子抽回去了。那座红楼完全停在寂静中，只是楼顶上的太阳旗被风在折合着。走在石头道街又碰到了个日本女子，她背上背着一个小孩，腰间束了一条小白围裙，围裙上还带着花边，手中提着一棵大白菜。我们又照样做了，不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说“就打倒你！”因为她是走在马路的旁边，我们就用手指着她而喊着。另一方面，我们又用自己光荣的情绪去体会她狼狈的样子。

第一天叫做“游行”、“请愿”，道里和南岗去了两部分市区。这市区有点像租界，住民多是外国人。

长官公署、教育厅都去过了，只是“官们”出来拍手击掌地演了一篇说，结果还是：“回学校去上课罢！”

日本要完成吉敦路这件事情，究竟“官们”没有提到。

在黄昏里,大队分散在道尹公署的门前,在那个孤立着的灰色的建筑物前面,装置着一个大圆的类似喷水池的东西。有一些同学就坐在那边沿上,一直坐到星子们在那建筑物的顶上闪亮了,那个“道尹”究竟还没有出来,只看见卫兵在台阶上,在我们的四围挂着短枪来回地在戒备着。而我们则流着鼻涕,全身打着抖在等候着。到底出来了一个姨太太,那声音我们一点也听不见。男同学们跺着脚,并且叫着,在我听来已经有点野蛮了:

“不要她……去……去……只有官僚才要她……”

接着又换了个大太太(谁知道是什么,反正是个老一点的),不甚胖,有点短。至于说些什么,恐怕也只有她自己的圆肚子才能够听到。这还不算什么惨事,我一回头看见了有几个女同学尿了裤子的(因为一整天没有遇到厕所的原故)。

第二天没有男同学来搅,是自动出发的,在南岗下许公路的大空场子上开的临时会议,这一天不是“游行”,不是“请愿”而要“示威”了。脚踏车队在空场四周绕行着,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是个很大的脑袋的人,也没有戴帽子,只戴了一架眼镜。那天是个落着清雪的天气,他的头发在雪花里边飞着。他说的话使我很佩服,因为我从来没有晓得日本还与我们有这样大的关系,他说日本若完成了吉敦路可以向东三省进兵,他又说又经过高丽又经过什么……并且又听他说进兵进得那样快,也不是二十几小时?就可以把多少大兵向我们的东三省开来,就可以灭我们的东三省。我觉得他真有学问,由于崇敬的关系,我觉得这学联主席与我隔得好像大海那么远。

组织宣传队的时候,我站过去,我说我愿意宣传。别人都是被推举的,而我是自告奋勇的。于是我就站在雪花里开始读着我已得到的传单。而后有人发给我一张小旗,过一会又有人来在我的胳膊上用扣针给我别上条白布,那上面还卡着红色的印章,究竟那红印章是什么字,我也没有看出来。

大队开到差不多是许公路的最终极,一转弯一个横街里去,那就是滨江县的管界。因为这界限内住的纯粹是中国人,和上海的华界差不多。宣传队走在大队的中间,我们前面的人已经站住了,

并且那条横街口站着不少的警察,学联代表们在大队的旁边跑来跑去。昨天晚上他们就说:“冲!冲!”我想这回就真的到了冲的时候了把?

学联合会的主席从我们的旁边经过,他手里提着一个银白色的大喇叭筒,他的嘴接到喇叭筒的口上,发出来的声音好像牛鸣似的:

“诸位同学!我们是不是有血的动物?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老百姓给日本帝国主义做奴才……”而后他跳着,因为激动,他把喇叭筒像是在向着天空,“我们有决心没有?我们怕不怕死?”

“不怕!”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地嚷着不怕,但我对这新的一刻工夫就要来到的感觉好像一棵嫩芽似的握在我的手中。

那喇叭的声音到队尾去了,虽然已经遥远了,但还是能够震动我的心脏。我低下头去看着我自己的被踏污了的鞋尖,我看着我身旁的那条阴沟,我整理着我的帽子,我摸摸那帽顶的毛球。没有束围巾,也没有穿外套。对于这个给我生了一种侥幸的心情!

“冲的时候,这样轻便不是可以飞上去了吗?”昨天计划今天是要“冲”的,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有点特别聪明。

大喇叭筒跑到前面去时,我就闪开了那冒着白色泡沫的阴沟,我知道“冲”的时候就到了。

我只感到我的心脏在受着拥挤,好像我的脚跟并没有离开地面而自然它就会移动似的。我的耳边闹着许多种声音,那声音并不大,也不远,也不响亮,可觉得沉重,带来了压力,好像皮球被穿了一个小洞嘶嘶的在透着气似的,我对我自己毫没有把握。

“有决心没有?”

“有决心!”

“怕死不怕死?”

“不怕死。”

这还没有反复完,我们就退下来了。因为是听到了枪声,起初是一两声,而后是接连着。大队已经完全溃乱下来,只一秒钟,我们旁边那阴沟里,好像猪似的浮游着一些人。女同学被拥挤进去的最多,男同学在往岸上提着她们,被提的她们满身带着泡沫和气

味,她们那发疯的样子很可笑,用那挂着白沫和糟粕的戴着手套的手搔着头发,还有的像已经癫病的人似的,她在人群中不停地跑着:那被她擦过的人们,他们的衣服上就印着各种不同的花印。

大队又重新收拾起来,又发着号令,可是枪声又响了,对于枪声,人们像是看到了火花似的那么热烈。关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完成吉敦路”这事情的本身已经被人们忘记了,惟一所要打倒的就是滨江县政府。到后来连县政府也忘记了,只“打倒警察;打倒警察……”这一场斗争到后来我觉得比一开头还有趣味。在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我绝对没有见过,但是警察我是见过的,于是我就嚷着!

“打倒警察,打倒警察!”

我手中的传单,我都顺着风让它们飘走了,只带着一张小白旗和自己的喉咙从那零散下来的人缝中穿过去。

那天受轻伤的共有二十几个。我所看到的只是从他们的身上流下来的血还凝结在石头道上。

满街开起电灯的夜晚,我在马车和货车的轮声里追着我们本校回去的队伍,但没有赶上。我就拿着那卷起来的小旗走在行人道上,我的影子混杂着别人的影子一起出现在商店的玻璃窗上。我每走一步,我看到了玻璃窗里我帽顶的毛球也在颤动一下。

男同学们偶尔从我的身边经过,我听到他们关于受伤的议论和救急车。

第二天的报纸上躺着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好像现在的报纸上躺的伤兵一样。

以后,那条铁路到底完成了。

1937.11.27 汉口。

作于1937年11月27日,发表于同年《七月》第1卷第5期,署名萧红。

文章记叙1928年底发生在哈尔滨的一次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学生运动。日本政府与奉系军阀秘密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其中规

定,由日本方面投资,承包东北五条铁路的修建工作。铁路一旦修通,日本即可顺利进兵东北。1928年11月,哈尔滨报纸披露了这个消息,学生及社会各界纷纷集会反对,要求保护路权。

近十年之后,萧红凭记忆写下本文,记录她参与学潮的经过和感受,显然为抗日的热情所激发。而青春时代的行为,也是她所愿意忆念的。

一九二九年底愚昧

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一九二八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一九二九年。于是根据着那第一次的经验，我感觉到又是光荣的任务降落到我的头上来。

这是一次佩花大会，进行得很顺利，学校当局并没有加以阻止，而且那个白脸的女校长在我们用绒线剪作着小花朵的时候，她还跑过来站在旁边指导着我们。一大堆蓝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时候，是佩花大会的前一夜。楼窗下的石头道上落着那么厚的雪。一些外国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边的枯树都膨胀圆了，那笨重而粗钝的轮廓就和穿得饱满的孩子一样臃肿。我背着远近的从各种颜色的窗帘透出来的灯光，而看着这些盾牌。盾牌上插着那些蓝色的小花，因着密度的关系，它们一个压着一个几乎是连成了排。那小小的黄色的花心蹲在蓝色花中央，好像小金点，又像小铜钉……

这不用说，对于我，我只盼想着明天，但是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离着，我是跳不过去的，还只得回到宿舍去睡觉。

这一次的佩花，我还对中国人起着不少的悲哀，他们差不多是绝对不肯佩上。有的已经为他们插在衣襟上了，他们又动手自己把它拔下来，他们一点礼节也不讲究，简直是蛮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几乎是看不见了。结果不独整元的，竟连一枚铜板也看不见贴在他们的手心上。这一天，我是带着愤怒的，但也跑得最快，我们一小队的其余的三个人，常常是和我脱离开。

我的手套跑丢了一只，围巾上结着冰花，因为眼泪和鼻涕随时地流，想用手帕来揩擦，在这样的时候，在我是绝对顾不到的。等